

茗上漫笔

湖数地

# 杭大新村,尺翰寄自道古桥(上)

## 今年104岁的他在善琮曾有“宋半镇”之称,从做笔、卖笔到创办企业,创下了“原产地湖笔品牌联合经营”“天价笔”等先迹——

# 湖笔奇人宋锦康

杨松源 汤建池



宋锦康

好后续颖透明整齐划一,宋锦康称之为“平头笔”(又称“齐锋笔”)。

“平头笔”一问世,很快得到日本客商青睐,在上海展览馆销售部,其中一支平头笔价格最高卖到1.4万元(这是中间商给桃源湖笔厂的价格)。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单支湖笔价格创下的一个“天文数字”!之后,来自东瀛的订单陆续不绝,最多的一张订单人民币达50万元。

不久,善琮湖笔厂、苏州湖笔厂、富阳湖笔厂等开始生产“平头笔”,发展成为多种规格的“平头笔”套笔。

由于“平头笔”大卖,造成山羊毛原料紧缺。为此,宋锦康竖起耳朵四处寻找毛源。有一次他从江苏吴江外贸公司那里得知,江苏南通市启东县(现为县级市)外贸公司有净货山羊毛。于是他立即找到启东县外贸公司科长。科长将本来批给苏州湖笔厂的500公斤净货山羊毛批给了桃源湖笔厂。此举,在统购统销时期,是一件不太可能做到的事,但让宋锦康做到了。

短短五、六年时间,桃源湖笔厂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工人从初创时20多人发展到200多人,绝大多数是当地的残疾人,桃源湖笔厂不仅解决了残疾人就业问题,而且成为吴江县注目的出口创汇企业。一度时间里,桃源湖笔厂的经济效益超过了以善琮镇为主的湖州全市湖笔生产企业经济效益的总和。

从“宋半镇”到办厂有方,他遵循的原则是“货真价实”“诚信为本”,“要想自己得到利益先要想到对方的利益”。近九旬的善琮镇著名笔工沈锦华讲述了他和宋先生交往中的一件事。宋锦康在桃源湖笔厂期间,长期订购沈锦华制作的高档羊毫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小镇信息不灵通,浑然不知大城市湖笔涨价的信息。宋锦康经常和沪、苏、杭的销售商打交道,所以他最早知道价格浮动的信息。有一年,羊毫兰蕊笔价格每支从7元涨到了9元,沈锦华不知道,而宋锦康早已知道了。他向沈锦华拿笔时,按照每支9元的价格计算。这让沈锦华不理解,但宋锦康不为高额利润动心,坚持诚信为本,这让沈锦华感动一生,两人成了终身的好友。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毛笔个体经营户逐渐增多,市场竞争更趋激烈。1993年桃源湖笔厂改制,桃源乡政府动员宋锦康买下产权。当时宋锦康已76岁,打算不想再留在桃源,决定和夫人回上海安度晚年。由于乡政府再三要求,宋锦康只好全盘接下。由于到了善琮之年,宋锦康经营企业不再谋求发展,因此,桃源湖笔厂规模逐年缩小。2008年,桃源湖笔厂只有5个工人,库存有数万支湖笔及一些原辅笔料。那年,宋锦康已90岁,陈云娥86岁,宋锦康便将剩下的摊子交给了他一手培养的湖笔工人侄孙女宋兴华管理。

宋锦康夫人回到上海4年后,陈云娥病逝。夫人走后,宋锦康心里还是惦记着桃源湖笔厂积压在仓库里的4万多支湖笔。2019年和2021年,我们两次拜访宋先生,每次去他都要拿出桃源湖笔厂库存湖笔的账本,希望帮助寻找销售门路。

一位百岁老人,还在销售湖笔,这让我们感到既惊讶又钦佩!更有惊奇的是宋先生在100岁时学会了使用手机微信,取名为百岁老人,并用微信和外界联系,推销库存湖笔……

宗阿姨照顾宋先生7年了。她告诉我们,宋先生除了患有痛风、高血压以及耳背外,没有其它明显的器质性疾。视力还很不错,头发花白且很茂密,由于发际线太底,儿子在给他理发时,不得不将其额头上的一片头发理平。“近先生的儿子头发都脱了,老人不仅不脱发,近几年头发渐渐变黑。”宋先生和我们交流时,说话中气很足,碰到重要的话题,还拿起笔在纸上写,写字手腕很稳,没有颤动。

虽已逾百岁,但宋先生饮食起居都很正常。晚上7点睡觉,早上7点半起床。早饭喜欢吃粽子、汤圆、定胜糕、馄饨等,一次早餐能吃下一个粽子或一块定胜糕,另加一杯牛奶。早餐和中餐之间和宗阿姨吃一会儿牌。11点半吃午饭,以米饭为主。那天我们和宋先生一起共进午餐,他喝了一杯橙汁,吃了小半碗米饭、10多个大虾仁和一块鸡肉,几乎不吃蔬菜。每天午睡约2小时,下午2点吃水果,喜欢吃西瓜、哈密瓜、荔枝等甜度高的水果。然后再打2小时牌。晚餐以稀饭为主,下粥菜是酱菜、肉松等。

“老人没有健身的习惯,也不讲究养生。他长寿主要是脾气好,我菜烧得好不好,他都没有意见,只说好吃。”宗阿姨这样认为。宋先生和陈云娥共养育一个女儿五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已经过世,子女都在上海,各自家庭生活,他们虽然孝顺,但也七八十岁了,宋先生从不计较子女看望次数的多少。

不计较、心态好,是宋先生长寿的秘诀。我们临走时,他在我们的笔记本上写下八个字:“活着一天,开心一天。”



画,还是钓鱼、种花、集邮这些都是选项。记得当年父亲与邻居沈惠森老师有个共同爱好,就是研究报上发表的大会名单,再通过各类新闻透露的讯息深入搜寻这些政治人物时任的相关职务。我比较爱好文艺,便从记录电影演员表入手,继而广泛了解文艺界人士的情况,同学曾经拿个参加国庆招待会的文艺界代表名单考我,哪真是烂熟于心对答如流哦。何为闲哉?就是在无所事事中找点事做并偷着乐。

种花,也是这段时期的家中书信的话题。无论远在西安的祖父,还是近在杭大的教授,都在谈论种花经或交流花籽。据说孙席珍家的院子种了很多花草,打理得很精致,很漂亮。

那时,我父亲偶尔想起有部《广群芳谱》的古籍,就给杭州的驾公师写信询问,很快就收到他于1979年6月8日寄自道古桥的回函:

一平老友: 示悉,《广群芳谱》自有此书,文革后失之,今不易得之矣。杭州裱工老者已衰,新者技术未过关而定价过昂。湖州价能较廉否?或尚未议及此,将来当奉颂。善琮笔名自各省市,或向用狼毫,湖州出产大逊于旧,去夏从扬州得较可用者,亦非一二十元不办。暑假能来杭否?

即颂近清  
驾吾再拜  
六月七日

王驾公龙凤舞的行草墨书复函,写在杭州红旗造纸厂出产普通稿纸上,夫子所言自是三句不离书画毛笔。当年杭城只有湖濱画社开设装裱业务,国营店真不二价自是“定价过昂”。说来也巧,1979年双林创办墨河画苑就以装裱业务为主,画苑草创时期的实际操作者为杭州的韩文颜,人称韩老,据说韩家与画家叶浅予夫人王人美沾点亲戚关系,在书画界人脉较广。他请来的兰溪裱画师王炳松入驻墨河画苑裱带,装裱业务大多来自苏杭。笔者当年大有这过眼名画之机会,不过那时只想追索现代时尚,对这些传统旧玩

兴趣不大,惟同事沈林江坚持裱画40余年终成业内的行家里手。王驾公较为入世,官瘾也有一点,可叹人生苦短,受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后不久便溘然长逝。其后,家父曾经用钢笔工整地在稿纸上抄录过明代王象晋所撰《群芳谱》之月季篇,1985年终于购得清代汪灏扩编之《广群芳谱》(四册全),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有道是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时过境迁,父亲再没兴趣研究花经而应时改研茶诗了。

### 二

孙席珍(1906—1984),学名志新,以字行,浙江绍兴人。曾任南京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受聘中国鲁迅研究会顾问、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写作学会会长等职。著有《近代文艺思潮》《战争文学论》《八国文学漫谈》《外国文学论集》等。

浙江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素有“半壁江山”之称。1921年孙席珍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聆听过李大钊、马寅初、鲁迅、周作人等先生的授课。自16岁起发表新自由体诗歌数百首,随之进入旅京的江浙文圈,被钱玄同、刘半农等戏称为“诗孩”,鲁迅也顺水而应之。孙席珍从京华才子到北伐军少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随郭沫若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其后一度流亡日本。孙氏长期投身左翼文化运动与抗战救亡运动,其“新乡土小说”代表作《阿娥》曾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赏识,并入选《活的中国》英文版专集在欧美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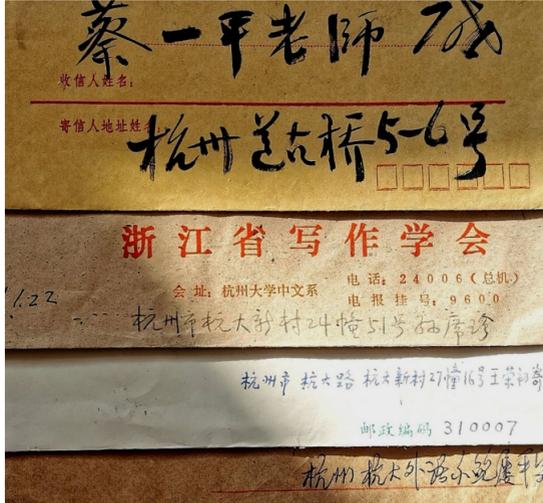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后,孙席珍作为著名的文艺活动家并未选择北上,而是急流勇退转型为大学教育家。尽管在知识分子扎堆的校园里过得并不如意,但毕竟远离了疾风暴雨的

政治漩涡,即所谓性格决定命运,这也是一种人生智慧。

从1952年起,孙席珍一直在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孙先生见多识广且博闻强记,讲课滔滔万言又风趣幽默,极擅调动受学生的热情很受学生的追捧。家父在浙师上学期间,语文与英语的成绩都很好,因研究外国文学起码得懂一门外语,故而受到孙先生的器重,还有就是彼此性情比较投缘,家父不善阿谀,先生拒绝奉承,这便建立起了长久的师生情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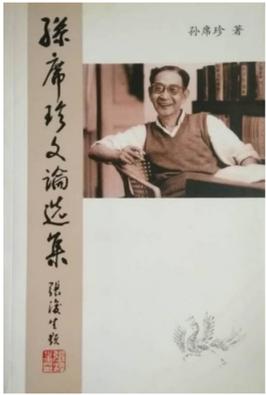
孙先生与家父的通信,尚存最早的是从1975年5月始,至1984年1月止,前后约50余通,而之前的函件可能因政治运动而未留存。家父1956年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孙先生助教,后因家庭成份较高受到排挤,1958年下放到平湖师范,之后经多校辗转至双林中学教外语。改革开放之初,大学教育开始步入正轨,许多老教授年事已高,迫切需要配备助手。1979年前后孙先生与家父的通信几乎都围绕这调回杭大的事宜,老先生为此事牵扯了很大的精力,最后因湖地不人而未果。1979年9月,父亲调入新组建的嘉兴师专中文科,重归本行担任外国文学的教学工作。

1979年,孙席珍携夫人赴北京出席中国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前往茅盾寓所探望。1982年《嘉兴师专学报》第1期学报开设“纪念沈雁冰同志逝世一周年”专栏,刊发文章15篇。孙席珍《纪念沈雁冰同志》文中提及:“早在‘五四’时期,我还是青年学生,就就读由他主编、经他大力革新了的《小说月报》以及他撰写的一系列评介西方先进文艺思潮和东北欧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文章,使我增长了许多文艺知识,开拓了文艺领域的



寄自杭大道古桥施宿舍的信函

视野,受益非浅。接着还读了他的一些有关古典文学的著作,诸如《楚辞》《庄子》的注释等等,很佩服他对中外文学都有深厚的造诣。”



《孙席珍文论选集》书影



王驾吾书对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老信筒

蔡忍冬

六合塔畔,秦望山麓,掩藏着一所绿荫红墙的大学,门对江潮,故名之江。

1907年始建的杭州之江大学与1905年落成的湖州湖郡女校,同为美国基督教教会创办的学校,在建筑风格上较为接近。2015年,笔者举家去杭州赏樱花,顺道参观了这座父母曾经就读过的校园旧址。

1951年,我父亲考入之江大学中文系学习。1952年夏,全国高等院校调整院系,之大中文系并入浙江师范学院并在此办学。1954年,我母亲考入浙师,在秦望山学习两年后,又到城内的体育场馆、道古桥辗转学习。小时候常听母亲提及六和塔的素斋很是可口,以素火腿为最。1958年浙师与新建的杭大等合并,定名为杭州大学。

道古桥,原本是座爬满青藤的宋元拱桥,后来修建公路改作水泥平桥,再后来西溪路扩建又被移建它处。据传,造桥者系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字道古,又经元代数学家朱世杰改名道古桥以感其德。桥梁跨经的西溪路旧称杭徽路,追溯起来还是一条古官道,直到1933年杭徽公路才全线通车,经古荡、东岳、留下直至昱岭关。

小时候祖母由城里的池塘巷迁居古荡镇,那条黄沙漫漫的杭徽路被称为“老马路”,新公路在此转弯接城中的武林门长途汽车站。那时,我最喜欢在野外的柿子林里远望这条依山公路,红黄相间的苏式长途汽车时隐时现地穿行于林间,绝似电动玩具车在盘旋。画家陆俨少由此入院南写生曾画过这段公路。

1958年,杭州大学正式组建。原浙师院的教工亦已提前由体育场馆搬迁到西溪路56号的道古桥宿舍。据大院子弟回忆:这里最初有数十栋小楼为苏联专家设计的,其中面积较大的几幢为中西合璧的“小洋房”,内部装修考究,红漆地板、宽阔木梯、抽水马桶、大理石浴缸、双开门阳台等样样俱全,前后还有桃红柳绿的院落,再配上道古桥的野逸雅称,令文人们更是浮想联翩。入住之初,便云集了夏承焘、姜亮夫、王驾吾、胡士莹、孙席珍、陆维钊、林淡秋等人文学者,还有许多其他各科名流,大先生们娶妇将雏室无长物,以书为伴桃李天下。当年的住房分配不完全按职称来,也有按家庭实际困难分配的,真是挺暖心的。这相对独立的小社会,遂成三代人的“伊甸园”。

### 一

王驾吾(1900—1982),名焕镛,号觉吾,江苏南通人。曾任杭州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图书馆馆长,中文系主任。著有《墨子集注》《墨子校释》《先秦寓言研究》《万履安年谱》《万斯同年谱》等。

记得小时候我家有把成扇,正面是山水,背面是书法,听父亲说起为“驾公所赐”,那个时候的学生尚沿用旧习,搞古典文学的尊称某公,搞现代文学的尊称某先生。不过少时我也就当一把普通的折扇,夏天便从抽屉里取出扇来,扇破了就拿橡皮膏粘一下再用,后因搬家而失。前些时候父亲翻出一副墨书对联是驾公手迹:“素月出东岭,白云宿檐端。”上款“一平贤弟正之”,落款“因巢王驾吾集陶”,铃印:王焕镛印章(白)驾吾(朱)。联语为集陶渊明句,笔墨文雅惜无纪年,据推断驾公晚年自号因巢老人,应为1970年代前后的作品。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校园生活过得比较闲散。教师们除了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外,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也足够充足,无论写作、画